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黄承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答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

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GDP至上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和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

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

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

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显绩与潜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

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竭泽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

显绩与潜绩并非对立取舍、此消彼长,而是互为前提、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量工作具有周期长、见效慢、成果不易见的特点,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需要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善非

一朝一夕之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样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重显绩、轻潜绩”的短视逻辑,热衷于修广场、建地标等“可视性”工程,而对污水管网、土壤修复、矿山治理等隐性投入缺乏动力;二是“重当期、轻远期”的考核偏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领导干部要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定力,多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潜功,让显绩有根基、潜绩有回响。

局部与整体并非相互割裂、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依存、协同发力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以系统思维和整体视野谋划,把每一个生态工程、每一项环保举措都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格局中去考量;健全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治理体系,推动各项生态任务同向发力、一体落实,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考核从“单项指标导向”转向“综合绩效评价”,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生态环境协同考核机制,让政绩答卷从单项选择走向系统集成。从系统和全局角度寻求科学治理之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正确政绩观,需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胸怀,彰显“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作为。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是跨越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关口,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

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战略定力的根基在于坚持正确政绩观。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环保“一刀切”、运动式“降碳”、虚假整改等现象,根本上正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把生态环保当成“包袱”想甩掉,把环保考核当成“关卡”想绕过。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涵养历史耐心,越是面临复杂局面和多重目标,越要稳住心神、保持定力,坚决不走“回头路”,不搞“急转弯”。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擦得更亮、根基扎得更深,才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保护。

算好长远账、克服短视行为,是涵养历史耐心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在伦理学上则构成了对后代发展权利的事实侵害。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从代际公平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坚持算长远账,将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纳入政绩评价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应变应求应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该办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革新,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纵深推进,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引领,都彰显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磅礴伟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我们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定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懈奋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式主义损害党的肌体健康,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深刻揭示了形式主义的症结所在,为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提供了科学指引。

从一定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为以主观主义想问题、办事情,使形式脱离甚至“反噬”内容。比如,在基层治理中,个别领导干部不到一线、不接地气,以了解情况为名,动辄让基层填报名目种类繁多、实质内容雷同的表格、材料,将网格化管理变成了“表格化治理”,使基层干部端着表格奔波在交材料的路上,捧着手机被“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压得抬不起头来。凡此种种,都是在用主观判断生搬硬套、机械替代客观实际。

如果说主观主义是形式主义的“病灶”,那么功利主义则是加速“病灶”扩散的诱因。抱着功利主义干工作的人,任途欲总是重于事业心。在他们眼中,衡量工作的标准不在于实干解决了多少问题,问题解决后群众是否买账、是否满意,而是能不能通过走捷径、用虚功在上级的“可视范围”内出新出彩。如果个人名利包袱太重,就会满脑子想着另辟形式主义捷径,搞泡沫政绩赚取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铺路,自然也就难以出于公心冒风险、担责任,不可能为群众的声讨硬骨头、接“烫手山芋”。

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

拔除形式主义政绩观的“病根”

欧阳锡龙

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得再多、“盆景工程”造得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镪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周功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正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思所盼,从脚下找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积尺寸之功、甘挑未成之事、甘挑最重担子、甘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推动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顾江 黄楹慧

文化产业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这一重要指示既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期,推动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既是破解传统产业大而不断强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形成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意味着突破传统经济增长范式,将数据要素、数智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一同纳入生产函数,拓展文化产业的价值创造与增长路径。

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在科技嵌入方面,加快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技术

内容创新、模式创新与场景创新,引领新型文化市场扩容升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增值,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文化内容方面,提升内容生产智能化水平,增强多模态文化内容识别和生成能力,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化领域深度融合,创作更多具有鲜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智能文化内容。比如,一些视频生成大模型的兴起,颠覆了短剧、漫剧等视频内容生产创作的全流程,以小投入、高效率、新模式重塑短剧行业价值链。

加快文化业态创新,激发体验经济活力。体验经济是文化新业态的复合形态和重要体现,能够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文化产业与农业、体育、旅游、商业等领域的多元化融合,体现了文化产业与多业态深度融合的空间与潜力,助力体验经济全面焕发活力。比如,江苏依托

文化遗产是赓续文明根脉、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进一步深化保护理念,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维护文化遗产安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遗产并非孤立静态的文物、遗址或技艺,而是文明演进、社会生活、空间格局和价值精神交织的有机统一体,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持续演进中生成、延续并更新的“文化生命体”。整体性保护,强调从文明整体和文化生态出发,把遗产本体、历史环境、空间肌理、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作为有机整体予以保护,在完整场域中呈现其历史厚度、文化温度和文明高度。系统性保护,强调以文明连续性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以整体关联统摄“点、线、面”,在把握遗产与人、环境、制度、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予以保护。两者统一于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条保护之中,彰显了以系统思维把握文明发展,以整体观念推进文化建设的科学方法,使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体化、静态化、碎片化的“对象保护”,转为对“文化生命体”的整体观照、系统传承和动态延续。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从安全保障、活化利用、协同治理、技术赋能等方面入手,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文化瑰宝。

筑牢安全屏障。文化遗产安全不仅关乎其本体和历史环境延续,更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当前,一些地区仍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监管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观念、法治方式协同发力,推动从事后处置转向全程防控。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处理好保护和发展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守牢文化遗产的安全底线,避免过度开发、不当利用、过度商业化等现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督察,聚焦建设施工、馆藏文物、数字资源等重点领域,完善风险识别、动态监测、预警处置的责任追究闭环机制,守牢文物安全底线。统筹本体安全、环境安全、数据安全、价值安全,将价值阐释、传播管理、数字治理纳入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错误思潮。

丰富共享场景。文化遗产是承载共同记忆、凝聚文化认同、构筑精神家园的公共财富。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文化遗产保护也应从静态保存、专业展示走向公共阐释、生活融入和价值共享。“十四五”时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41亿人次,每年举办展览超4万个、教育活动超50万场次,文化普惠水平持续提升。但部分文化遗产仍存在开放不足、体验不强、融入生活不够等问题,公共价值尚未充分释放。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维护遗产本体及其历史环境、空间肌理和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同时大力拓展公众的参与和体验空间。依托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主题游径、乡村(社区)博物馆、非遗工坊等载体,构建城乡贯通、点线面结合的共享网络。同时,可分类制定开放利用清单,推动低级别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使散落在城乡空间中的历史遗存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社区更新、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

强化协同治理。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多部门、多层次、多领域,具有鲜明的复合性、公共性和系统性。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求以整体性治理回应文化遗产系统的复杂结构,以制度协同贯通保护各环节,以共建共治共享凝聚多方合力。政府在统筹规划制度供给和公共责任落实,专业力量重在学术阐释、技术支撑和价值评估,社会力量重在激活资源、融入生活、拓展场景,公众参与则推动遗产保护转化为共同守护、共同传承、共同受益。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文化遗产保护权责边界不清、规划衔接不足、信息壁垒较多、执法协同不畅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一监管,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治理从“多头分治”走向“系统集成”:理顺各级政府文物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责任清晰、投入稳定、考核有力的保障机制;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席机制,推动相关部门规划衔接、信息共享、事项联办、执法协同;探索文化遗产合理利用负面清单制度,规范社会资本参与特许经营,明晰公益性保护与经营性利用边界,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推动技术赋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作出部署,这对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加强数智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数字建档、智能监测、虚拟修复、活化传播,为遗产保护、研究、传播与利用全链条注入新动能,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效能。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为统领,以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等为牵引,系统梳理文物、非遗、文化景观等资源要素,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分类管理走向谱系建构,构建动态更新、支撑决策的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同时提炼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基因、价值理念等精神内涵。建立“资源识别—技术赋能—价值阐释—场景转化”实施链条,支持文化遗产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产投资,提升风险预警、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能力。探索文化遗产数据确权、分级开放、授权使用和安全监管制度,促进资源可识别、数据可流通、权责可追溯。完善价值评估、数字建模、IP授权、场景运营等机制,健全转化收益、回馈保护、惠及社区、支持传承的闭环体系。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研究员)



新赛道,释放小众圈层消费活力。通过场景多元化拓展等方式,不断开拓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范围经济效能的持续放大。

推进治理现代化,以科技向善支撑产业健康发展。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的形成,既体现在产业领域经济总量的提升,也体现在文化领域创新内容的生成。这就要求兼顾经济效益与价值引领,以科技向善规范产业发展方向。要健全适配数字文化新业态的监管机制、版权保护体系与内容治理规范,完善包容审慎、精准高效的治理模式,引导数字文化业态规范有序发展,为培育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文化领域数据安全治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文化内容生产中的应用,防范伦理风险,构建起科学规范的治理框架,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张颖岚

刘骋